

中拉关系

塑造中拉共识： 论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

赵重阳

内容提要：文化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拉文化外交经历了文艺外交和文明外交两个层次。随着中拉关系步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中拉文化外交也上升到思想外交层次。中拉已经具备了进行思想外交的条件：拉美国家主观上更加认同中国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理念，中拉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拉已提出构建发展未来关系的先进理念。中拉思想外交的重心是塑造中拉共识。当前，中拉应就三对问题达成共识。一是一致性与差异性，其实质是“和而不同”的问题；二是共同发展与自主发展，其实质是“共建共享”与“自立自强”之间的平衡问题；三是主动性与相互性，其实质是“互学互鉴”问题。中拉可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多元化文化外交主体、推进学术文化外交、完善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加强文化产业合作等路径共塑中拉共识，并使其深入中拉双方社会，最终内化为双方民众的共同认知。

关键词：中拉合作 文化外交 构建发展 思想外交
中拉共识

作者简介：赵重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73；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8)06-0066-14

文化外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因其柔性特质成为中国推进外交工作、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路径。当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大，文化外交对于中国在国际上塑造积极正面的大国形象、化解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以及反制西方文化霸权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新热点。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对于中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①，加强文化外交、构建中拉共识将成为中拉关系在未来可持续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 文化外交的定义

文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广泛流行的概念之一，其在美学、社会和政治理论以及社会学话语中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是最早提出文化定义的学者。他于1871年提出文化的“复合整体说”，即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中国的《辞海》将文化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范畴。广义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文化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③也有学者将文化设定为三个层次：一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二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制度、习俗文化；三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④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人类一切精神、物质活动及相关设施与器物都属文化的范畴和载体。由于文化是人类因共同生

① 赵重阳、谌园庭《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③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022页。

④ 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载《外语研究》，1992年第2期，第1页。

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是被人类社会共享的知识和被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具有共通性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加剧，文化因素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各种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文明冲突论”、新自由主义的“软实力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等。尽管角度不同，但这些理论都认为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深层次和持久的，文化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影响和塑造着国家对世界体系的认知及其行为方式，文化的受认同度还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其中，建构主义有关“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观点，以及“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而非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的论断，为国际体系形态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观察视角和期待。

鉴于文化对国际政治的战略意义以及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深刻影响，文化自然与外交结合到一起，形成以文化为内容的外交形式，也就是文化外交。对于“文化外交”的定义，学界也未形成具有普遍共识的概念。一般而言，文化外交指以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①在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今天，军事等硬权力手段已不再是国家获取国际权力的主要选择，而文化外交则因其柔和性、灵活性、潜移默化性和效果的持久性成为各国维护本国主权、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选择手段。

由于文化的内涵十分宽泛，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和涉及的领域也应灵活而广泛，可分为文艺外交、文明外交和思想外交三个层次^②。文艺是文学与艺术的统称。^③文艺外交是以文艺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外交活动，是文化外交的初级阶段。由于人类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具有共通性，这些共通性就通过艺术作品等载体得到体现。当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建立联系、进行沟通时，文艺外交往往成为最优先、最自然的选择。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是相对于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④。文明表现为一种社会成果和发展水平，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文明外交是文化外交的中级阶段，是在文

① 李智著《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② 范勇鹏《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28页。

③④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022页，第4024页。

艺外交的基础上，通过文教、新闻、传媒合作等方式加强双方对相互文明的认知，树立彼此积极、正向的形象，以达到进一步加深了解、密切关系的效果。思想亦称“观念”，是思维活动的结果^①。思想是文化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影响着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思想的传播与竞争会产生话语权，因而是国际关系中争夺的核心利益。思想外交可以传播一个国家为世界根本问题的系统性知识，是文化外交的高级阶段，因为“如果他国人民接受了这种知识，便会产生观念上的认同感，进而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按照这种知识生产者的指引来行动”^②。文化外交的这三个阶段并非全然割裂，而是相互包涵、层层递进的关系，并在不同阶段达到与外交对象建立联系、密切关系、塑造共识的效果。

二 中拉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

中拉关系发展已有近 70 年的历史。作为中拉关系的相对主动方和主导方，文化外交一直在中国对拉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对拉文化外交的内涵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经历了文艺外交、文明外交和思想外交三个阶段。

（一）文艺外交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文化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周恩来总理曾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各驻外使馆应重视贸易和文化工作。”^③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就是文艺交流，首先利用文艺活动及相关团体之间的交往与外交对象建立联系，再寻找机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由于双方距离遥远，还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古巴除外），不要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即使是进行正常的交往都十分困难。为了尽快与拉美国家建立联系，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对拉文化外交，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392页。

② 范勇鹏《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30页。

③ 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

如派遣各种专业性代表团和演出团体访问拉美，邀请拉美知名人士、民间和半官方代表团访华或举办展览，通过对华友好人士推动拉美国家建立对华文化协会等友好组织，以及通过发行西班牙语电影和书刊加强对拉美的外宣工作等。

这一时期中国对拉文化外交多以文艺交流为主，属于文艺外交阶段。文艺外交使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并保持了联系，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拉关系正常化进程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文艺交流虽然能够使双方人民体会共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传播高端、先进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位，但却“无法影响深层的动机”。让别国人民欣赏中国悠久、精深的艺术形式“并不必然使其在文明竞争和国际关系中变得更加善意、更加合作”^①。因此，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文艺外交虽然对中拉关系正常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真正促使中拉关系正常化的因素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拉美对中国国际权力认知的改变。

（二）文明外交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冷静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自身，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约16.4%的速度增长^②，并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并参与创建一些新兴的国际机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拉关系也迅速密切起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拉贸易额较20世纪90年代初呈数十倍地增长，形成跨越式发展。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和政治势力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从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等各个角度诋毁中国。在拉美地区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论调。与此同时，世界很多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仍停留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精神风貌毫无认知。为了使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中国扩大了文化外交的内涵与范围，侧重点也从以往的文艺交流转向文明交流。如中国积极呼吁建立国际新闻和传播新秩序，增强自身的信息与传播自主权；同时通过建立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主办“文化年”“文化节”等对外文化活动，将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作为平台和契机，大

^① 范勇鹏《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30页。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9—2012年数据得出。

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外交活动，增进了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树立了中国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国家形象。^①

中国对拉美文化外交的形式也得到拓展。一是通过举办文化节、博览会或电影周等各种文化活动，向拉美民众展示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当代社会精神风貌。二是加强与拉美国家在新闻和传媒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建立面向拉美的传播平台，加大报刊、电视、电台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对拉美地区的宣传，邀请拉美媒体记者团访华以及举办“中拉传媒论坛”等活动，提高对拉美地区的文化话语权。三是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文教合作。通过在拉美国家开设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桥”等活动以及相互支持翻译经典名著等方式，增进拉美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拉美国家的学术交流以及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些举措旨在增进拉美社会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社会风貌的认知和了解，属于中国对拉开展文明外交的阶段。

文明外交能够使拉美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渊源和特质，增进其对真实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但是，文明外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国对中国的身份认知，其对别国决策的影响也只是在行为层面而非认同层面^②，因此文明外交虽然能增进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但并不能有效增加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这一时期大部分拉美国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出于国家发展和应对国际关系体系转型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认知和观念的认同。

（三）思想外交阶段

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后，国际形势的转变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基于西方价值观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消费模式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激化了南北矛盾，也使地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给人类未来的生存造成深重隐忧。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大，正在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中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发展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将建设新型国际

^① 杨洁篪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512782.shtml. [2018-03-15]

^② 范勇鹏 《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0 页。

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总目标。对于差异性和多元化日趋显著的国际社会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应和谐共荣地发展，更意味着国际社会应寻求对合作性共有知识的建构和认同。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结合传统文化精髓与当前社会实践，提出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心议题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的文化外交也需要相应地进入思想外交层级。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中拉关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拉美时提出，中拉在未来应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了“构建发展”的新阶段。未来中拉不仅要从小战略高度规划双方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合作路径，还需构建和塑造同属中拉人民的价值观和认知理念。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也应从注重加强沟通与了解的文艺和文明外交向致力于塑造中拉共识的思想外交迈进。

三 加强中国对拉美的思想外交

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阶段后，将从以往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各自发展需要的反应式发展模式向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主动筹划型”发展模式转型^①。这就需要中拉在继续加深政治、经济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构建和塑造中拉共识，并将其内化为双方社会的共同认知。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拉美的思想外交，以确保中拉关系在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文化外交尚属中拉关系的短板，思想外交尤为欠缺。中国的文化外交长期以文艺外交为主，近年来文明外交逐渐加强，而思想外交尚属起步阶段。在冷战结束前，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外交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和维系联系的主要手段，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与成就斐然的中拉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相比，中拉文化外交的发展稍显滞后。如中国政府在2008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只有两句话提及“文化交流”；在文件

^① 赵重阳、谌园庭 《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21页。

列举的需要加强合作的4个领域中，“文化交流”仅被列为“人文和社会”领域的一项合作内容。可见与其他领域相比，当时中国对与拉美的文化外交重视不足，内涵相对狭窄，也欠缺实施的力度。在中国政府2016年发布的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中，“人文领域”被列为一个单独的合作领域，包含了文化体育、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学术与智库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对拉美文化外交的实施力度明显加大，实施领域也有很大拓展，但仍主要局限于文艺和文明外交的范畴之内。

其次，能否塑造中拉共识将决定未来中拉关系的发展状态。中拉关系发展到当前水平，已经建立了充分的高层政治互信和较全面的经济合作网络。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政治意愿都很明确，经贸合作的模式也得到不断完善和更新。相应的，中拉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由早期的单纯接触性碰撞转为更深层次的、观念性的认同缺乏。如中拉对相互身份、意图、希冀等的认知存在不小的差异。中国视双方为发展中国家，认为中拉关系应是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拉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北方国家”，对拉美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中国有义务帮助拉美实现工业化等。需要指出的是，持类似观点的人存在于拉美各个阶层，甚至包括一些研究中拉关系的学者。因此，中拉应着力构建和塑造积极、正向、面向未来的中拉共识，这不仅决定着双方未来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深度，也决定着双方的合作是出于现实利益所需还是基于相互认同的战略选择。

最后，中拉已具备开展思想外交的条件。第一，拉美国家在主观上更加认同中国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理念。拉美国家独立后大都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信奉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经济上对西方国家依赖很深。因此，中拉关系早期发展缓慢既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也源于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抗拒和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完全照搬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其影响一直持续未消。拉美民众对“民主”的认同度不断下降。根据民调显示，拉美民众对“民主”的认同度从2010年的61%下降到2017年的53%，只有1/3的受访者对当前拉美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①。而中国坚持依据自身国

^① “Populist Backlash in Brazil and Mexico?”, in *Latin America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Review*, November 2017, p. 6.

情制订发展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实的对比不仅使拉美国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了更加客观的认知，也使其更加认同中国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理念。

第二，中拉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为思想外交提供了制度保障。机制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创建机制的目标、理念，机制设计和机制的运行模式等都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对参与方而言，“通过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①。也就是说，在建立和运行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参与方通过遵循共同的机制理念、遵守共同的机制规则而形成共有观念，并最终将其内化到自身的文化当中。当前，中拉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体系，其中既有全球性的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有区域间整体性的和次区域间的合作平台（如中拉论坛、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更有产业、行业间的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不仅为中拉务实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拉思想外交提供了制度保障。因为只有在遵循机制所秉持的理念、规范和利益观的前提下，双方的合作才能平稳、持久、深入地进行。

第三，中拉已提出构建发展未来关系的先进理念。在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整体合作和“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双方就互为发展机遇达成共识，明确了双方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中拉合作机制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等战略理念确定了双方合作的原则、目标和方式。由于这些机制大多由中国提出并推动建立，机制所秉持的理念多带有中华文明的核心印记，同时也体现着人类谋发展的共同愿景。这些理念有的同样蕴含于拉美文明之中，但有的对拉美人民而言较为陌生。这就需要双方在进行务实合作的过程中，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这些理念进行辨析以促进理解，以最终形成共识并加以贯彻。

四 中国对拉思想外交：塑造中拉共识

尽管中拉加强合作的愿望十分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的文化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双方在历史、语言、种族、宗教、社会制度、习俗以及价值观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大差异。基于这个原因，中拉文化外交历来注重加

^①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第133页。

强相互了解，以求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而事实上，相互了解并不必然带来相互理解，也不必然意味着相互认同与合作，甚至还有可能产生矛盾与冲突。因此，未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应在继续加深相互了解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相互之间的认同，塑造中拉共有观念。

（一）塑造中拉共识

鉴于文化影响的持久性和全覆盖性，中拉共识应该力求达成面向未来关系发展的共同认知，而不应试图改变双方固有的文化特性。有关中拉共识的表述应该是精炼化和概念化的，以增强双方社会的接受程度。应将中拉共识贯彻到具体的合作进程当中，而非只停留于政策宣言的层面。总体而言，中拉双方应就三对问题达成共识。

第一，一致性与差异性。中拉双方有很多一致性。如双方都面临发展的任务，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都寻求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改革，以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等。除此之外，中拉的一致性还体现在各自文明的多样性上。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与融合周边文明、外来文明的精华，形成“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和而不同”的理念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印记之一。拉美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美洲印第安土著文明和非洲黑人文明等多种不同来源文化的汇合和融合，同样具有多元性的特点。然而，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表面看来，双方对这一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提起中拉关系时都会强调这一点，并表示加强沟通与了解是增进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在实际合作的过程中，双方最初对因这些差异造成的问题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比如，作为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方，中国企业进入拉美的意愿和规模都远远大于拉美方面，并曾因缺乏对拉美的了解而遭遇许多挫折甚至失败。在经过 20 余年的摸索和实践后，中国企业已逐渐对拉美市场的特性有了足够的认知和心理准备，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但拉美国家和民众似乎对中拉差异性在现实中的体现仍准备不足，也缺乏接受和适应这些差异的意识。对拉美社会而言，“尽管‘差异化’是拉美社会的文化财富，但实际上……接受‘存异’并非易事”^①。因此，中拉应就双方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达成社会共识，使双方民众对

^① [哥伦比亚] 多米尼克·达瓦德 《当我们谈起中国，我们在谈论什么？》，载《环球财经》，2018 年 2、3 月合刊《战略 2018》，第 98 页。

这一概念从词语认知转化为思想认知,方能在合作中真正接受、适应和克服这种差异性,以实现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致性与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就是“和而不同”的问题。

第二,共同发展与自主发展。发展是中拉双方都面临的首要任务。加强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到目前为止,中拉合作对双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共同发展并不能代替自主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饱经忧患,“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质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在初期也得到当时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扶,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主发展的意志,既不屈从外界胁迫,也不盲目跟随别国的发展模式,自立自强与冷静谨慎并行,才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拉美方面,受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影响,“庇护主义”是拉美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而这种情结也被拉美国家带入了国际领域^①。独立以后,拉美国家也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转换过多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拉美国家在自主发展时意志不够坚决,借鉴西方模式时又过于激进,使国家和社会遭受重大冲击,未能实现改革的初衷。当前,中拉合作为双方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如何享有、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国家发展却是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拉美不能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不可能代替拉美构建发展模式,双方都没有代替对方发展的义务。当前很多拉美人士,包括一些拉美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帮助拉美国家发展和实现工业化,并认为中拉关系的未来取决于此。事实上,且不论中国是否有能力帮助拉美国家实现这些目标,仅从外交原则而言,中国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其发展内政。共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主发展,而非代替自主发展。因此,“共同发展与自主发展”的实质就是“共建共享与自立自强”的问题。

第三,主动性与相互性。中拉交往合作的过程就是相互了解、适应和学习的过程。交往合作能否更加深入和富有成效,取决于双方相互学习和适应的主动性有多大。当前中拉合作的意愿都十分强烈,也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保证双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政治、经济各领域推动建立了多种合作机制和倡议,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力求推动中拉关系持续向前发展。这些举措既有宏观层面的,如推动建立中拉论坛、倡议共同构建

^① Norman A. Bailey, “The United States as Caudillo”, in *Journal of Inter - American Studies*, Vol. 5, No. 3, July 1963, p. 315.

“1+3+6”合作新框架、邀请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等；同时也在微观层面设立了多项合作基金，或推行具体的交流计划和培训计划等。中资企业大都能够通过前期调研、风险评估和调整策略等举措积极了解和适应拉美市场，并取得越来越积极的成果。相较而言，大部分拉美国家在推进中拉关系方面显得过于被动，未能提出自己的清晰思路，在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中拉务实合作方面也显得滞后。只有中拉双方都积极、主动地推进中拉关系，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长处和优势，相互调整和适应合作的理念、规则和方式，才能使中拉合作更加高效、顺畅地进行。综上可见，“主动性与相互性”的实质就是“互学互鉴”的问题。

（二）如何塑造中拉共识

确立中拉共识并不是只局限于政府部门的政策倡议，而应该是面向中拉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具体的观念塑造与内化。因此，建立中拉共识的路径以及参与主体也应该是整体协调、多元并举的。

充分利用好中拉合作机制。机制设定了参与者的认同、利益和行事规范。机制内的合作过程就是参与方克服“异质性”、建立“同质性”的过程。长期的机制合作将使合作方对特定事务的认识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趋于一致，而这种一致将进一步内化并外溢到其他领域。当前中拉之间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合作机制体系，双方应进一步完善这些机制，并通过机制内的合作使中拉共识在多层次、多部门得到最大限度的明确和提倡。

多元化文化外交主体。由于以往中拉文化外交以文艺和文明外交为主，因此，外交主体基本局限于相关政府部门和新闻、教育等机构。然而，文化更深层的含义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是社会整体的认知。因此，文化外交特别是思想外交应当是针对社会整体的行为。这就需要拓展文化外交的参与者群体，将其从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扩展至与拉美存在互动的各产业部门、民间机构乃至个人，有意识地引导和动员他们从实际互动中传播中拉共识，通过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多维度多领域地开展对拉文化外交。

推进学术文化外交。学者和智库是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既担负着向国家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的职能，也扮演着向社会大众阐释政策、思潮的角色。由于中拉在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中拉合作的新理念和共识有些能在拉美文化中找到共鸣，有些则完全区别于拉美文化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这就导致拉美国家虽然对这些理念十分关注却未必能理解其思想内涵的情况。拉美民众对其更是知之甚少。对

此，应提倡双方学者在学术交流中就这些理念进行辨析，厘清其思想内涵，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并将其上传下达给中拉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

完善文化传播体系。塑造共识需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当前，中拉相互了解的主要渠道是西方传媒，拉美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尤其受到西方媒体舆论的影响。对此，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传播体系，加强对拉美民众的传播能力，以完整地塑造中国在拉美的形象。文化传播体系除了教育、媒体、影视、网络等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方式外，还应包括进行文化传播、复制和接收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制度，以及创造、传播、复制和接收文化信息和文化实践的组织，这些组织活动的方式包括交通模式和交往模式^①。通过完善文化传播体系，向双方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讲述中国和拉美双方的故事、传递中拉共识，从而使中拉共识被双方各阶层所熟知和接受。

加强中拉文化产业合作。文化产业是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以市场方式推动的、以文化产品贸易为主的商业行为^②。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扩张，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强势文化的扩张虽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引起了其他文化的警惕和抵制，甚至形成冲突。文化产业通过市场化运作，使文化产品更贴近市场，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此，文化产业在塑造和传播思想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拉应以双方文化的契合点为切入点，加强文化产业合作，创新合作思路和方式，拓展文化产业合作的受众面，通过文化产业合作增强双方民众对中拉共识的理解和认同。

五 结语

文化是被人类社会共享的知识和被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由于文化是人类因共同生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同文化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由于文化外交的柔和性、灵活性、潜移默化性和效果的持久性，

^① [英] 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1页。

^② 贺双荣 《文化产业与国际形象：中拉合作的可能性——以影视产业合作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0页。

而日益成为各国维护本国主权、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文化外交分为文艺外交、文明外交和思想外交三个层次。

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也经历了文艺外交和文明外交的层次。随着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对拉文化外交已进入思想外交层次。当前，中拉已经具备了开展思想外交的条件：拉美国家在主观上更加认同中国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理念，中拉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拉已提出构建发展未来关系的先进理念。中拉思想外交的重心是塑造中拉共识。鉴于中拉文化的差异性，中拉共识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正向的共同认知，而不应试图改变双方固有的文化特性；应该用双方社会能够理解并接受的方式表述中拉共识，并着力将中拉共识贯彻到具体的合作进程之中，而非只停留于政策宣言之上。

当前，中拉应就三对问题达成共识。一是一致性与差异性，其实质是“和而不同”问题；二是共同发展与自主发展，其实质是“共建共享”与“自立自强”间的平衡问题；三是主动性与相互性，其实质是“互学互鉴”问题。中拉可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多元化文化外交主体、推进学术文化外交、完善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加强文化产业合作等路径共塑中拉共识，并使其深入中拉社会各阶层领域，最终内化为双方民众的共同认知。

(责任编辑 王帅)

Key words: BRICS , Johannesburg summit , G7 , trade protectionism , multilateralism , international order

66 Shaping China–Latin America Consensus: On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Latin America

Zhao Zhongyang

Abstract: Cultural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China–Latin America cultural diplomacy has experienced the levels of artistic diplomacy and civilization diplomacy in previous decades , and now it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level of thought diplomacy. At present ,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ave already had the condi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ought diplomacy , the focus of which is to shape the shared consensu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two sides should reach consensus on three issues: consistency versus difference , common development versu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 and initiative versus mutuality.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could shape and internalize the consensus through relevant measures ,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al diplomacy actors , and the promotion of academic cultural diplomacy , etc.

Key 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 thought diplomacy , China–Latin America consensus

80 The Applic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licies for Mercosur Countries

Joaquín Andrés Gallego Mendañ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paper is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particularly in Mercosur countries. Prior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s were below most Mercosur countries. However , since 1979 , when China decided to implement several major economic reform measures ,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 it has successfully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recent years , China has emerged as a major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 economic recip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dopted by Mercosur countries during the 1990s had proved to be not very positive , and sometimes even disastrous. Thus , Mercosur countries began to take China as an economic leader. Many el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policies could be adapted to Mercosur countries in order to generate a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 such as heavy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 the creation of an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 and more emphasis 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These policies are attainable for Mercosur countries if a proper political agenda can be created.

Key words: China , Mercosur , economic reform , trade liberation , FDI

96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Military Exchange: Current Status ,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Cui Shoujun , Liu Zuoli

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y , the